

现实不仅仅是“问题小说”

□王德领

我们今天的现实可谓怪怪离离,荒诞、魔幻得无以复加。而作家对现实的关注度也一下子变得高涨起来。当然,这里所说的现实,不是小资进行时,不是泡沫剧,不是一些“80后”作家所谓的“小时代”。这里所说的现实指的是“大时代”,一个让人无法逃避、无法不正视的大时代。

和平年代的中国现实,虽然没有战争时期的杀戮和血腥,也有许多触目惊心的画面: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收入不均问题……面对这样的现实,田园牧歌式的抒情显得苍白无力,批判现实主义从没有今天这么需要和迫切。比起香软的青春文学、网络流行的玄幻小说、官场小说、穿越小说、职场小说,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锐利的掘进,需要巴尔扎克式的对这个时代的气势恢弘的观照,需要一种俯瞰大时代的超强的目光。

的确,许多作家都已经进入到关注现实的层面,意识到现实并不是快乐大本营,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它频频用狰狞的一面提醒善良的人们。而尽力拥抱当下的现实,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将现实处理进小说。我们当下的作品,流行将现实简化的风气。而小说里的现实,应该是经过作家充分心灵化的。如果没有将现实心灵化、个性化,无论现实多么鲜活茂盛,多么活色生香,一旦被平移进作品,就会变得毫无生气,干枯一如冬天的原野。小说里的现实,往往和作家的想象力结合在一起,带着作家本人的经验和情感。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将刘姥姥描述成大观园里的一个过客,因为他对刘姥姥的日常生活并不熟悉。莫言《生死疲劳》的想象力让人惊叹,在那里,生死轮回成为表现中国20世纪后半叶农村的演变史,那个时代有关乡土中国的哀伤几乎都囊括进作家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身上了,“现实”化蛹为蝶,成为一个精灵,弥散在作品里。这与莫言在农村长大不无关系。所以,优秀的作家,对现实的发言能力是建立在自己的充分体验上的。

如果说前些年流行的底层写作、打工文学还带有一定的话题性,带有作家故意为之的赶潮流的特点,近年的现实关怀则变得十分自然,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作家内心的选择。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余华的《第七天》是具有代表性的两篇作品。之所以把这两篇小说拿出来加以评述,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对待现实的途径。一是直接概括现实。方方借助涂自强这个形象,概括了一代寒门子弟在都市苦苦

的生存现状。二是以“新闻串烧”的方式大面积罗列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现实成为新闻事件的混合物。这两种方式,共同都是对现实的切近关照,都有过分粘滞于现实而不够阔大的特征,带有“问题小说”过分关注问题而少了蕴藉的不足。不同点是关注的方式有明显区别。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是一篇典型的社会问题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出身贫寒的农村青年幻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悲剧故事。在涂自强出生的大山村,考上大学的涂自强成了拯救村民的英雄。村民对他讲:“当个大官回来。”“回来把村里的路修宽点,好走大卡车。”通过这些话语,可以看出这些偏远山区弱势群体的无奈,他们仿佛被这个日益迅猛发展的社会遗忘了。他们天真地认为,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进入体制,进入体制就会做大官,有了权力就会造福一方,拯救黎民于水火。可见,村民的想象还是停留在迷信知识改变命运的80年代。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整个社会迅速地进入了物资时代,资本加速控制了每一个人,物质利益几乎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大学扩招,毕业即失业已经成为常态。涂自强上了大学,而贫穷一直跟着他,成为他的烙印,就像原罪一样。由于贫困,村民给他凑钱缴学费,他为了不从家里拿钱,拼命节省。和他一起在食堂打工的女生虽然对他有好感,但是在金钱面前还是离开了他。涂自强毕业了,没有正式单位接纳他,他沦为了武汉这个大城市的一名漂泊者。他拼命工作糊口,可是屡屡受骗的经历,使得他满身疲惫。他乡下的房子塌了,母亲受了伤,他只得把孤身一人的母亲接到武汉。他租住最差房子,生活最节俭。在这个城市里,他如同草芥。在求生生存的拼命的挣扎中,涂自强病倒了,得了绝症。他没有医保,没有存款,拒绝了医生让他住院的要求。他剩下的日子已不多,面对绝症,涂自强的心理彻底垮了:“人生还有多少美好呀,而他却要别它而去……他对自己的人生想过很多很多。为了这完美的人生,他一直都在做准备,也一直拼命地努力。他惟独没有想过他根本就没有人生。”

小说充分表现了物质对一个人的挤压,带有这个物欲时代的强烈印记。涂自强的悲剧是一个群体的悲剧。一个普通年轻人,出身贫寒,毕业即失业,在大城市里没有户口,找不到正式工作,过的是“蚁族”生活,幸福对他如此的吝啬。小说

具有典型意义,写出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穷困的草根一族的真实命运。

遗憾的是,小说在极力贴近现实的同时,过分粘滞于现实。整篇小说显得太实,基本没有留白,削弱了艺术感染力。尤其是将那么多的苦难堆积到涂自强身上时用力有些过,在结尾处写到他患了癌症,这样的处理似乎不太自然。一般说来,揭示社会问题的小说,人物往往成为问题的附庸,有直奔主题的弊病,方方的小说也没能摆脱这一窠臼。从这一点来说,涂自强这个人物有些概念化、血肉不够丰满。

相比《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余华的《第七天》所暴露出的问题更为突出。在这里,余华把现实密集地如同新闻串烧一般处理进作品。这里面的医院死婴事件、故意少报火灾死亡人数、地下卖肾交易、野蛮拆迁等,都和现实存在着对应关系。当然,作家应该直面现实,这是作家的良知所在。但需要追问的是:这样写现实是否有效?反映现实是否就意味着把现实问题直接搬进小说?余华认为,《第七天》所写的社会问题,并非是他刻意表现的,因为那就是社会常态:“我们的生活是由很多因素构成的,发生在自己和亲友身上的事,发生在自己居住地方的事,发生在新闻里听到看到的事等等,它们包围了我们,不需要去收集,因为它们每天都是活生生地跑到我们跟前来,除非视而不见,否则你想躲都躲不开。我写下的是我们的生活。”余华不去收集,不需要去收集,那么活生生跑到我们跟前来,除非视而不见,否则你想躲都躲不开。我写下的是我们的生活。”余华不去收集,不需要去收集,那么活生生跑到我们跟前来,除非视而不见,否则你想躲都躲不开。我写下的是我们的生活。”余华不去收集,不需要去收集,那么活生生跑到我们跟前来,除非视而不见,否则你想躲都躲不开。我写下的是我们的生活。”

尽管我在读这部作品时,感到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个余华部分地回来了,行文冷静、超然、节制,文字的练达、简洁、叙述节奏的控制,都让人感到似曾相识。相比那部拉拉杂杂的《兄弟》,《第七天》要好很多。但是,相比《活着》的温情和悲悯,《第七天》则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还没有一篇直面现实的新闻报道能够触及我们的灵魂。直接对应现实的写作,暴露了

■主持人的话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是2013年引起较大反响的作品,对其评价呈两极分化的状态。而这其中争论的焦点,恰好就是“现实”问题。有论者说,这不是现实——实际上他要说的是:“这不是我所经验过的现实”。而另外的论者可以立即站出来,这就是“我经验过的现实啊”,并能迅速举出实例一二三。经验的现实?逻辑的现实?集体的现实?哪一种“现实”才是文学所真正需要面对和处理的?或者说,这根本就是一种理论的臆想。

——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

余华的写作困境:没有哲学的支撑,没有历史观念的支撑的写作,往往会流于表面化。即使它的叙述者采取一个死去的人的视角来讲述,但是也掩饰不了罗列现实的弊病。即使是它“借助了《创世记》开篇的方式”,以魔幻、荒诞的方式描述了那个骷髅人的世界,但也不会改变作家在表达现实上的简单、笨拙。

作家对现实关注度的提高,是新世纪文学出现的新动向,这彰显了中国作家力图加强对现实的发言能力。许多作家意识到,现实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对现实的表现也是从问题入手。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无论是方方、还是余华,还是其他致力于表达当前中国现实的作家,都还没有找到表述现实的恰当方式。现实就是一个人的不幸吗?如果我们把现实定位为“问题”的堆积地,就永远不会写出伟大的作品,因为,现实不仅仅是问题的从生场所,而且有它内在的逻辑和秩序,有它的丰富性和驳杂性。现实拒绝简化,永远比作家高明,它在更高处伫立着,等着我们去把握和表达,它是沉默的,我们只看到了它千疮百孔的表面,而对于它内在的繁华和灿烂、衰败和颓废,我们却视而不见。中外文学史的经验证明,把现实停留在“问题小说”的层次,就会遮蔽现实的丰富性,难以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文学如何表达现实”讨论之七

论不休的问题,由于否认或忽视天才的存在,很多理论家说了一大套也没有讲清楚,甚至越讲越离谱,在阿来与舒晋瑜的对话中,一句话就点透了。

另外,舒晋瑜访谈录的“采访手记”写得很好,像优美的散文。例如对格非的访谈是这样开头的:“有时像又密又急的秋雨滴落无边的湖面,有时像飘飘扬扬的雨丝遮掩参差的屋宇。格非的文字,带着一种淡淡的忧郁和优美的诗意,让人不由自主走进江南小镇飘渺的雾气。”简直就是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妙诗稿,既写出了江南的美景,又出神入化地描绘出了格非的文字韵味。

舒晋瑜有一自喻:“生在山西,长在山东。因率性,喜欢随和;因固执,喜欢宽容;因木讷,喜欢幽默;因传统,喜欢时尚。不爱热闹,不慕虚荣,不喜欢扬。”她总以“勤以补拙”自勉,有一股倔劲,甚至显出一种执拗。要采访哪位作家,就非采访到不可;要写访谈录就非写好不可。我对她的“倔劲”与“执拗”非常钦佩,但是光有这股劲是不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学访谈录”的,我愿意用阿来的话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是天赋。”倘没有文学的灵性,可能对真正优秀的作家,作品视而不见,人家即使接受你的访谈,你也不到“点子”上;回答出文学的真谛,你却听不出“真音”,再勤奋也是妄然;当然,有文学天赋,没有舒晋瑜说的那股“倔劲”与“执拗”,也不可能成才。舒晋瑜和她所采访的那些作家,都是天才加勤奋结出的硕果。

作家需要灵异,能与天才作家心灵相通的对活者也必须要有灵异。舒晋瑜是富有灵异的。作为一位优秀的文学记者,她和所访谈的作家们之间有着一种互通的文学灵异,他们的交流在当代中国文坛凝聚起一种特殊的文学气场,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因此,“文学访谈录”是活生生、实实在在的文学访谈,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另一种历史。

仅有理念,而且有实践,称得上是现代民主体制的真正实践者。当然,“联省自治”肯定也有弊端,或许会造成长期军阀割据的局面。相比之下,孙中山的“出兵北伐”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同样也有相当的支持者。黄继树虽然对陈炯明抱同情,但他仍如实写了孙中山的政治理念所受到的拥戴。第二章《分道扬镳》中就专门提到陈炯明“实在不明白梧州”的置民们为何如此听孙中山的话,心甘情愿地倾巢出动,为他效劳”。陈炯明在具体的问题上颇具实践能力,孙中山似乎在更大的范围内具有卡里斯马魅力。孰是孰非,孰利孰弊,确实不是一本书可以说得清楚的。

不仅历史文学是书写的,历史本身也是由人书写的。文学家与历史学家不同,文学家关注的,往往不是历史事件的真与伪,历史选择的是与非,这些历史学家擅长的话题,文学家不可能妙笔生花。文学家的长处在于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历史学家不敢触碰的地方,恰恰是文学家施展身手的世界。《北伐往事》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正是对孙中山和陈炯明这两个人物内心世界的书写。《北伐往事》用去大量篇幅的是孙中山与陈炯明的互相猜疑。在孙中山一方,由于陈炯明掌有兵权,孙中山时时刻刻担心发生兵变;在陈炯明一方,由于孙中山经常表现出来的非理性特征,令他时时刻刻担心自己死于非命。他们两人的互相猜疑不仅关涉个人品质,而且关涉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等。

《北伐往事》虽然标题“往事”,但作者的文学家身份使他本能地去“知人论事”。从人出发,以人为本,惟其把握了人,纷繁的事才可能变得清晰,杂乱的事才可能理清逻辑。黄继树以书写大历史的视野,以兼容“了解的同情”、“同情的了解”的方式还原历史谜局。他或许不能为我们提供历史结论,但他却能够带我们走进历史,走进历史人物的内心。

值得注意的是,《北伐往事》不仅写了孙陈之争,而且写了蒋介石的崛起,写了在桂林大本营聆听孙中山演讲的年轻军官叶剑英、叶挺、薛岳、张发奎等人的存在,“人生代际无穷已,日月年年望相似”,黄继树从来不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他更乐意“百年回首看民国”。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我却想说另外一句话,“历史未曾终结”。这是《北伐往事》的意义所在,也是黄继树所有历史文学书写的意义所在。

■新作快评 宁肯中篇小说《塔》《山花》2014年第2期

无神论者的『宗教皈依』

□刘晓明

宁肯在中篇小说《塔》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特殊的文学人物——谭一戈。他是国内一流的审讯专家、法学教授,司法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一生参与审讯过不计其数的神秘案件,当然也包括不少被“双规”后死不开口的高官。对这些人,他都能通过自己的智慧和技巧撬开对方的嘴巴,因而在业内赢得了非常高的声誉,也被某高级审讯机构的负责干部视为挚友。但当谭一戈获知自己罹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时,在选择离开人世的样式上,他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谭一戈意外发现佛教高僧在他们“诸德圆满,诸恶寂灭,灵魂离开躯体获得新生”而圆寂后,身边弟子要对他们施行“火葬”,即僧人圆寂坐化的时候可以坐在陶缸里,缸内置好木炭、柴草等,7日后引燃这些柴草,木炭将遗体火化,他们的遗体火化后会出舍利子。之后,寺院将其修建舍利塔供奉。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甚至拒绝宗教,只相信法律的谭一戈仿佛突然找到了一个有趣的非世方式,他想设法请求寺院方丈让他“坐缸”,将自己的所有遗产布施给寺院,并在寺院里等待自己的最后时刻。谭一戈还和年轻方丈打赌,他的遗体一定能烧出七七四十九(也是他的享年)颗舍利子,年轻方丈表示,果真如此的话,寺院将为他建造“浮屠”(塔),以示供奉和永久纪念。谭一戈当然不是大德高僧,但他却想出了让自己遗体烧出舍利子的“科学方法”,并为此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就在这时,谭一戈接到了哭的乞求,请他“出山”协助审理一个死硬的违纪高官。哭告知谭一戈,他们几乎用尽了所有审讯方法,但这个关键人物就是死活不开口,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工作进程”,因为对方只要开口,就会顺藤摸瓜出他背后更重要的“大老板”。哭为此亲自到寺院面见谭一戈,谭一戈却对他兴致勃勃地说起自己如何说服了年轻方丈让他“坐缸”,同时自己也必须穿上寺里的袈裟接受剃度、皈依等坐化之前的仪式,甚至还有所谓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咒语”。谭预言自己将是该寺五百年以来第一个获得七级浮屠的人。他要哭保证在他彻底“断气前”将他送回寺院,否则寺院将不会接受他回来坐缸。谭一戈下了山。在调查了所有视频和档案之后,他终于和那个缄默不语、死不开了口的屠屠面对面,胸有成竹的谭一戈对屠屠使用了一个“不是方法的方法”,直接告诉对方自己已病入膏肓,一直在化疗,在屠屠确认谭一戈将不久于人世后忽然开口说话了,并且以“传记”的方式代替沉默,这使得这场审讯仿佛变成了一次人生访谈,屠屠从自己一生走过的路“娓娓道来”,滔滔不绝;而谭一戈则一边为自己注射杜冷丁,一边冷静、耐心地等待着。直到杜屠这个重量级人物浮出水面,直到血慢慢地从谭一戈的嘴角渗出。这场对峙是生命对生命、死亡对死亡角力,没有胜者却惊心动魄。谭一戈用最后的意志支撑着自己成为一件活着的艺术品,令人震撼;而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贪腐分子却已被死亡激发出了无穷的倾诉欲,急不可待地抓住最后时刻,旷日持久般地喋喋不休。人的多重性格在这里意外地交叉重叠在了一个空间里。

小说最后,从从容镇定地把谭一戈送回寺里,谭一戈如愿“坐缸”,“哭最后看了一眼缸中的谭一戈,的确,看上去已经圆寂,非常安详,完全像刚刚去世的人”。一年后,哭去慈云寺住了三天,每天他都要在一座塔前伫立良久。

这篇小说以一个罪案为壳,中间包裹了权力、官场、腐败、正义、罪恶,还有作者虚构的那片厂深处的一间白色密室,但这些似乎只是一张张拼图,当它们拼接完成后,呈现出来的已经是另外一个景象……恰如谭一戈变成了一座塔,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最终选择了以这种奇特的样式终结一生,成为小说里最神奇曼妙的一笔。想想那陶缸里果然出现了49颗晶莹剔透的“舍利子”时(其实是谭一戈预先将49颗晶石吞到了肚里),寺院里的僧众会怎样惊叹!或许,身患绝症的谭一戈所追求的形式上的最后谢幕是他作为一个严谨法学家的一次浪漫的精神逆袭,但这注定是他一生中最为独特的瞬间,他以一种禁锢的方式完成了生命的超越。那么,充满哲思意味的《塔》,已远远超出了一篇小说的架构和内核。

■评论

文学赤子 作家知音

□张梦阳

舒晋瑜的《说吧,从头的说起——舒晋瑜文学访谈录》(作家出版社2014年3月)充分体现了作者热爱文学的赤子之心。作为一名职业的文学记者,舒晋瑜对文学的热爱,不仅是职业性的,更是发自内心的。书中的种种细节让我确信,她不愧为当代中国的“文学战地记者”(苏童语)。

舒晋瑜真正懂得文学,这一点是不易做到的。我在《透·准·醇——汪曾祺文谈欣赏》一文中看到,有些著作等身的所谓文学理论家,出了多少卷的厚重“文集”,但其实并不真正了解文学的价值。在长期的“左”的政治束缚下,很多文学评论家写的“宏论”,其实不是文学论文,而是“大字报”。但舒晋瑜的文学访谈录却是真正在谈文学,并谈出了文学的真谛。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2010年8月舒晋瑜采访莫言。在文学如何走出去、怎样走出去的问题上,莫言说:“如果说我的作品在国外一点点影响,那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思想的个性,人物的个性,语言的个性,这些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我不了解很多人,但我了解农民,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土”字说到了莫言之所以走向世界的关键。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采访、论述,文章、书籍,浩如烟海,但我觉得在文学如何走出去、怎

《北伐往事》:历史未曾终结

□黄伟林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曾两次发动北伐战争。黄继树的《北伐往事》写的是1922年孙中山发动的第一次北伐战争。单纯的历史书写,主要关注的是历史事件,见事不见人,优秀的历史文学书写却必须见人见人。《北伐往事》中,作者不是采取历史学家见事不见人的历史言说方式,他不仅关注历史事件,更关注历史事件后面的人。人的出场,使历史变得波诡云谲,在为历史言说增加种种难度的同时,也为历史言说增添了许多魅力。

《北伐往事》的用心用力之处,在于作者黄继树塑造了孙中山和陈炯明这两个“民国强人”的形象。好的文学必须超越成王败寇的道德眼光,写出人物的真实形象和深层性格。在《北伐往事》中,作者显然不再沿袭庸俗文学的思路,被打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军阀也常常有道德优越之处。如段祺瑞的“六不”:不抽烟(大烟)、不喝酒(花酒)、不嫖、不赌、不贪、不占;吴佩孚的“四不”:不纳妾、不积金钱、不出洋、不走租界。同时,《北伐往事》对孙中山、陈炯明两位主人公之道德判断上,不偏不倚、袒护不护,没有将历史的选择归之于道德原因,这恰恰是理性的历史学家立场。

一旦摘下道德的有色眼镜,我们处处可见孙中山和陈炯明两个历史人物的鲜活形象和性格冲突。比如孙中山的“狼、大、快”,即敢于冒险、抓大放小、当机立断;陈炯明的“勤、紧、韧”,即勤勉、谨慎、坚韧。在书中,孙中山标高鹭远,大胆行事,成则轰轰烈烈,败亦在所不惜。陈炯明深谋远虑、行事周密,既想成就一番事业,又照顾民众的感受。如段祺瑞的“六不”:不抽烟(大烟)、不喝酒(花酒)、不嫖、不赌、不贪、不占;吴佩孚的“四不”:不纳妾、不积金钱、不出洋、不走租界。同时,《北伐往事》对孙中山、陈炯明两位主人公之道德判断上,不偏不倚、袒护不护,没有将历史的选择归之于道德原因,这恰恰是理性的历史学家立场。

历史人物的性格,对历史的影响至关重要。《北伐往事》第七章《风云突变》,写到外国记者对孙中山“狂人”气质的议论。虽然是无法定性的推测,但《北伐往事》对孙

样走出去的问题上,舒晋瑜和莫言的那次对话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舒晋瑜是作家的知音,她促使他们讲出了心中的真话。记得舒晋瑜曾经跟我说过:访问每位作家之前,一定要“做足功课”,不但要细读所有作品,从作家的处女作、成名作、代表作,直到争议作都须细读,而且还要看关于这个作家的所有评述甚至轶事,尽量都有所涉及。为了采访苏童,舒晋瑜将他的新作《黄雀记》看了3遍。对话中,她问苏童是否写得少了?苏童坦率地说,自己一直在写短篇,但是只有出版长篇的资格才能反馈到媒体这里。这句话提醒舒晋瑜开始反省自己的偏颇,采访后,她找到《收获》杂志执行主编陈永新要来30年作品发表目录统计一遍,发现苏童是最勤奋的作家。从此之后她常常找来文学期刊,尽可能多地了解文学信息。

正因为舒晋瑜怀着极大的热情和真诚投入工作,与作家心对心地交流,被访谈的作家才愿意开诚布公、坦诚心扉。在对阿来的访谈中,舒晋瑜问道:“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成就了阿来?”照过去的思维方式,很多作家会讲许多感谢党和人民的培养、故乡的哺育等套话,阿来却坦率地肯定:“当然是天赋。”并反问道:“方土地又不是养育了我一个人,如果没有更高的智慧,为什么会从‘最不被养育的一群人’中出来?”作家是如何产生的?这个文学理论界长期争

中山的“狂人”性格,确有涉及。“狂人”与“伟人”之间的关联,确实是历史学家不太容易关注的地方,这是《北伐往事》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又一个可取之处。

历史的结局与历史人物的性格有关,但绝不仅取决于历史人物的性格。《北伐往事》不仅关注人物的性格,而且关注人物的“理念”。作品写第一次北伐的成败,很大程度上,是孙陈两个历史人物“政治理念”的冲突。如果仅仅关注历史事件,孙中山领导和发动的第一次北伐很容易被理解为“功败垂成”。然而,这或许只是人们看历史的一厢情愿。历史事实是,孙中山的第一次北伐,虽然大张旗鼓,终于无功而返。第一次北伐无功而返的历史事实表面看是陈炯明后院起火,深层看则是孙中山与陈炯明两位“历史强人”的“政治理念”发生了严重冲突。这个“政治理念”是什么?就是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与孙中山的“出兵北伐”。

黄继树费了很大功夫阐释孙中山和陈炯明的“政治理念”。对于陈炯明,黄继树甚至动用了他的文学想象。从花山壁画到赵院称王,作为岭南人的黄继树对岭南历史有其独到的心得,他从陈炯明对赵院的言说中找到了“联省自治”原始历史资源,甚至将神秘的“花山壁画”想象成民族自治的形式。花山壁画与赵院治粤,一虚一实,将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政治理念铺垫得水到渠成。作为一个政治家,陈炯明与孙中山各有其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理念有是非之争,但并不关乎政治理念执守者的道德品质。如此,《北伐往事》就与以道德代替历史的书写方式划清了界线。

“联省自治”与“出兵北伐”孰是孰非?这不是本文,也不是《北伐往事》这本书要解决或能解决的问题。《北伐往事》的意义在于写出了这两种政治理念的历史存在,也写出了这两种政治理念各自的历史合理性。进而,作者以这两种水火不相容的政治理念布局《北伐往事》全书的情节线索,架设全书的冲突框架,把握到了历史的脉络和魂魄。

其实,无论是“出兵北伐”,还是“联省自治”都各有利弊。陈炯明坚持“联省自治”,固然有岭南自治的历史渊源,但主要还是基于他对现代民主体制的理解,陈炯明不